

爱乐者说

声透心灵的“忧郁”

■李近朱

【俄国大师柴可夫斯基和拉赫曼尼诺夫就一直在音乐中涂抹着浓浓秋色,洒播着绵绵霜雨。】

德国作家尼克·巴科夫的小说《忧郁的星期天》,有一个真有其人的“忧郁”的故事。这人就是匈牙利作曲家、莱索·塞莱什(Rezs Seress, 1899—1968);“忧郁”的故事,讲的是他失恋后的一个大雨滂沱的星期天,望着雨,他绝望感叹:“真是一个忧郁的星期天!”于是,灵感突至。30分钟后,一首凄美的歌曲诞生。歌词咏道:“秋天到了,树叶落了,爱情死了,风正哭着。我心不再盼望一个新的春天。”如此忧郁的词加上更加忧郁的曲,就有了聆曲人呼唤着“忧郁的星期天啊,我的末日即将来临”纷纷自杀的传说。显然,传说夸大了音乐的“杀伤力”,但却表达出音乐声透心灵的力量,其中,“忧郁”音符尤为为劲厉。

“忧郁”,不是抢天呼地的悲剧,也不是直捣心腑的伤恸,它犹如缓缓入心的秋雨,虽没有冬日的凛冽、夏时的酷暑,却是绵绵无绝“愁煞人”的慢性侵蚀。因此,人们都说,宁要一过的痛苦,不要漫长的“忧郁”,也就是俗话说,宁要短痛,不要长痛。忧郁,就是长痛。

音乐因其抒情特质,往往能够触碰到人的情感深处。在过往的音乐遗存中,与晴朗的莫扎特、雄劲的贝多芬、狂热的李斯特与沉思的勃拉姆斯等人相比,音乐天空也弥漫着一抹若《忧郁的星期天》一样直击人心的“忧郁”色调。俄国人柴可夫斯基和拉赫曼尼诺夫就一直在音乐中涂抹着浓浓秋色,洒播着绵绵霜雨。

19世纪的多半个世纪,柴可夫斯基度过了他

那末到一个甲子的悲情生涯。尽管他也有诸如《天鹅湖》《意大利随想曲》等作品的明快,也有《第一钢琴协奏曲》《1812序曲》等作品的雄浑;但在他的悲剧性的《弗兰德斯卡·达·米尼》《曼弗雷德》以及他的后三部交响曲中,音符罩满了“忧郁”。他所特有的下行音调,成其典型音乐特征。如他题献给挚友梅克夫人的那部称作“我们的交响曲”的《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中半音模进的音调和动荡不定的节奏,铸起柴可夫斯基独有的“忧郁”叹息。在《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中,也出现了这种浸入心灵的郁声呜咽。据说,在他为最后一部交响曲命题时,曾想到了“悲伤”“悲剧”等多个低沉词语;他弟弟脱口而出“悲怆”,让作曲家一锤定音。“悲怆”,就是行走在“痛苦”边缘上的深重“忧郁”。

在体悟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特征时,人们往往以“悲歌”二字涵盖,这不无道理。但再细聆深品柴氏音乐时,却又有了列维坦《金色的秋天》画中那样的绿荫枯萎之感。这满溢而出的,正是深愁的“忧郁”。因此,“忧歌”二字冠以柴可夫斯基,似亦确切。

在柴可夫斯基身后,又走来一位俄罗斯人。那是“长着六尺半愁容”的拉赫曼尼诺夫。艺术家的多愁善感,与生俱来。“他最不能忍受别人流泪。甚至为了停止街边小孩的哭泣,而将自己口袋的钱全部掏空给出。”第一部交响曲首演失败之后,他的精神竟崩溃了。他怀疑自己的作曲才能,深陷悲观之中。经过英国医生的催眠等精神疗法,他才慢慢康复。他的《第二交响曲》问世是在12年之后,《第三交响曲》则晚至30年后。

这位敏感的作曲家,极易跌落在感性的网罗中。当看到瑞士画家阿诺德·班克林的《死亡

岛》时,虽只是黑白色的印刷品,却引发了他的泉涌乐思,写出了同样充满黑色阴影的交响诗。他的最初作品不乏情感上的“秋色”,如浪漫曲《悲伤的收割》、钢琴幻想曲《悲歌》、《d小调第二“挽歌”三重奏》以及乐曲《凋零的花朵》等。这些作品显示出拉氏音符正慢慢浸入到秋雨一般的“忧郁”之中。

至于那部彪炳于史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开头那段深厚得让人窒息的悠长音调,与其说是俄罗斯式的辽远与广袤,不如说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深长无边的叹息,声响满蕴沉郁的“秋色”。第二乐章的抒情音调是带有泪痕的歌唱,以至于让罗曼·罗兰联想到了战争废墟上人的无奈和忧伤。

在俄国革命之后去国的时日,远离故土所带来的浓浓乡愁,又铺陈在他的谱纸上。如《第四钢琴协奏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三交响曲》和《交响舞曲》等,音符缠绕着绵绵愁绪,这愁绪就是那个纠缠不休的“忧郁”。这个暗色的“忧郁”,反倒点亮了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风范。在他的比莫扎特比贝多芬比柴可夫斯基更长的一生中,他的作品表明了一个艺术现象,以比喻来说,就是夕照比白昼更有力量。这力量,就是无尽的“忧郁”所带来的直击人心的艺术魅力。

在艺术界域,往往压抑的悲剧性情感,如悲哀、伤感、痛苦,特别是忧郁,更能直触心弦,震撼人心,并焕发出一种深刻的美感。声透心灵的“忧郁”,实质上体现出了悲剧的力量。因此,从柴可夫斯基、拉赫曼尼诺夫等人音乐里升起的“忧郁”的地平线,是一个满布秋色的瑰丽的艺术世界。因此,爱乐者才深情地说:我爱上了他们音乐中的“忧郁”!

名人赞颂图书馆

■武夷山

【所以,她认为,图书馆拯救了她,她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写道,“图书馆是云中的彩虹”。】

古往今来,多少人讴歌图书馆。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梳理一下我了解的关于图书馆的名人名言。从美国科幻文学、奇幻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与青少年文学作家 Ursula K. Le Guin (娥苏拉·勒瑰恩,1929—2018)的看法说起。

她在一篇散文中写道,“知识使我们自由,艺术使我们自由。一所伟大的图书馆就是自由”。一头扎进词语的海洋,在思想的广阔原野上漫游,攀登想象力的山峰。好比卡内基图书馆内的孩子,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内的大学生,那就是我的自由,那就是我的欢乐。至今,我的欢乐、我的自由之所在仍是图书馆。

那种欢乐不可出售,不可“私有化”,不可使之成为拥有特权者的又一种特权。公共图书馆是一种公共信托机构。

那种自由(注:free的另一含义是免费)不可打折。图书馆必须向所有需要图书馆的人开放,我说的是“每个人”,“当他们需要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时时刻刻。

亨利·沃德·比彻(1813—1887年),是一位美国牧师,也是他所在时代最雄辩的演说家之一。他在全美国和英国作过很多场关于道德和公共事务的讲演。他强烈反对奴隶制度。在南北战争期间,他在英国巡回演讲,呼吁支持北方。他对图书馆的看法是:“图书馆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的必需品之一。”

瑞士道德哲学家、诗人和批评家 Henri Frédéric Amiel(亨利·弗里德里克·埃米尔,1821—1881)说过:“你为了获得更美好的未来和成功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写在书里了。那么你猜怎么着?你所需要做的是去图书馆。”

Norman Cousins(诺尔曼·卡森斯,1915—1990)是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作家、社会活动家、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他说过,“图书馆是思想诞生的产房,是历史苏醒过来的地方”。

詹姆斯·鲍德温是美国黑人作家(1924—1987),出生于纽约的黑人聚居区哈莱姆。因家贫,他受教育不多,主要靠在图书馆阅读自学。哈莱姆有两所公共图书馆,13岁之前,他就将两所图书馆的书读遍了。于是,他又去市中心更大的公共图书馆看书。这个出生于贫民区的孩子长大后最终进入了文学圣殿,他对图书馆感激不尽。

我十分喜欢美国黑人女诗人玛雅·安杰罗(1928—2014)的作品,翻译过她的多篇诗作。她从小感受到种族隔离制度带给黑人的创伤;她的叔叔为躲避三K党的迫害四处藏身;她的祖母曾遭到白人女孩的侮辱;白人牙医曾因为她是黑人拒绝给她拔牙。于是,她拒绝说话长达6年之久,别人都以为她是哑巴。直到8岁时,一位黑人太太知道玛雅不会说话,就带她去一所黑人学校的图书馆看书,对她她说,“我要你把这个图书馆里的每本书都读一遍”。图书馆很小,大约有300本书。这些书是白人学校赠送的旧书,好些书都残破了,孩子们自己动手进行修补。玛雅当时心想:这么多书哇,我这一辈子还读得完吗?她确实将这里的每一本书读完了。更重要的是,她觉得图书馆里很安全,不像外部世界充满歧视。所以,她认为,图书馆拯救了她,她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写道,“图书馆是云中的彩虹”。她曾深有体会地说:“信息帮助你认识到,你并不孤单。密西西比也好,东京也好,都有人哭泣过,渴望过,伤心失落,但他们仍然快乐着。因此,图书馆帮助你认识到,不仅是你并不孤单,而且,你与其他任何人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



千里涂鸦

立体的中国 多元的世界

■郑千里

【摄影也要不忘初心——还原事物的真实面貌!】

立体的,中国的,真实的,百年的,震撼的,也是现代科技与艺术生动结合的,《百年沧桑画中国立体影像展》,4月初在天津市博物馆展出。

此展览是我国著名的发明家和立体影像的收藏家李昌,为观众带来的立体视觉盛宴。

展览的结束语言简意赅,出于对老朋友李昌的了解,我知道肯定出自他的手笔:“……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我们回顾历史,更加感到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共同祈祷世界和平,保卫世界和平,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寥寥两百字,李昌两处提到“世界”,当然也提到亲爱的中国,我们曾经经历过百年的风雨,以及惨遭外国列强的入侵和凌辱,灾难深重的旧中国。

“知道家”李昌多次周游列国,睁大眼睛看世界。

李昌第一次飞出国门,是他大学毕业两年后的1984年。在天津的中国民航学院(后更名中国民航大学)任教的他,带着自己的一项三维成像重大发明成果,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最高奖项的金奖。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1973年创办,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瑞士联邦政府等共同举办,是世界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发明展之一,也是全世界发明者重要的展示舞台,最具有影响力的发明展之一。由于早年中国的闭关锁国,李昌参加的这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也是我国参展的第一次。

到了日内瓦李昌才知道,欧洲本是立体成像技术的发源地,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立体成像技术发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后人耳熟能详、曾画出旷世名作《蒙娜丽

莎)的达·芬奇。

李昌推崇达·芬奇。因为达·芬奇既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发明家,也是一位聪明绝顶的艺术家。

1986年,李昌到美国波音公司游学,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立体成像技术。遍访美国相关的专家学者,再一次拓展了李昌理性看待世界的目光。

世间万物包括我们通常见到的照片,其物质结构从严格意义上说,其实都是“立体”的,只不过我们有时必须借助特殊的眼镜来观看和探索照片等物体。

2015年,李昌参加全国政协考察团奔赴新疆哈密,用五镜头大型立体相机拍摄《大美中华》,就是“全副武装”地带上了“重型”武器。

“立体影像术语中的‘视点’,就是从几个镜头看物体、看世界。我用得最多的是50个镜头。像《黑客世界》,就要用多视点相机拍摄,多到上百个摄影机或照相机,这样才能够出现漂浮的奇妙效果。”李昌曾对我深入浅出地科普,“但过多的特技可能会影响物体或景物的真实性,也有负面的作用。所以,摄影也要不忘初心——还原事物的真实面貌!”

世界是多元的。多元的世界,我们必须以“立体”的眼光、全方位考察的眼光,或者以特殊的“眼镜”看待世界,洞察世界,才能明察秋毫,置身洞若观火的理想境界。

只有明察秋毫,我们才能进退疾徐;只有洞若观火,我们才能得道多助,在世界千变万化格局中谋求和平共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期待人类大同。

李昌深知必须以史为镜,必须以人为鉴。这些足可为镜为鉴的历史,既包括中国的历史,也涉及世界的历史。

四月春光正明媚,莅临天津博物馆观光感受,亲身体验《百年沧桑画中国立体影像展》,必定大饱眼福。

游走东邻

【虽然还不知道下次开放注册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去加入“共享剩饭”大军了。】

现在的“共享”概念就是在一个平台上,把自己暂时用不到的东西进行分享,给正好需要它的人使用,以此提高某一个物品的利用率,发挥出它的最大效果。被共享的物品可能是平台提供(自行车等),也可能是用户所有(单反、手机等),通过“共享”这一行为再给其他人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获得了利润。

在这样一个“共享”的时代,日本虽然没有满大街的“小黄车”,却在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共享”起来,甚至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比如“共享剩饭”,再比如“共享朋友”。

“共享剩饭”这个概念来自一个叫作“reduce go”的App,在苹果和安卓系统中都能下载。“reduce go”的基本理念是把餐饮业的剩余食材“共享”给周围用户,用户只需要每月向平台交纳1980日元就可以每天两次免费去附近的饮食店领取“剩饭”。举一个例子,比如我家附近的披萨店今天剩了10个披萨没卖出去,但是按照卫生标准过了今晚就要全部扔掉,这样就造成了10个披萨的浪费。有了“reduce go”这个平台之后,披萨店可以将剩余食品的内容告知平台,由App向住在披萨店附近的我推送消息,我就会高高兴兴地骑上我的小自行车去领一份披萨回家当晚餐了。

对于我这种“穷学生”来说,晚餐是吃“中华”还是吃“和食”,是吃“拉面”还是吃“披萨”并不那么要紧,重要的是能快速地找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店来填饱肚子。一个月只要1980日元,每天可以领取两次食物,相当于午餐晚餐都能解决,这在东京这个高消费的地区简直是福音。就算每顿饭最便宜的定食是650日元(这在学校附近大概连一碗拉面都吃不上),一个月30天,每天两顿饭,就要花掉近4万日元。如果能节省下每月食费中的3万日元,我甚至可以偶尔去吃顿“米其林”来改善生活了。就在我乐颠颠地准备去挑选我的“剩饭”时,得到了一个坏消

飞沿走笔

既要造人也要造机器人

■张田勘

【因此机器人,尤其是带有人工智能软件的机器人就成为人工劳动力的最好替代,它们不怕苦不怕累,而且比人工的效率高百倍千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中国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减少了63万人,与此同时,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造成出生人口下降,特别是一孩出生人口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尽管各方面的专家还在对中国的出生率是否急剧下降进行激烈的争论,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2017年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比日本的出生率还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了5.32%的惊人低生育水平。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已经在采取措施。3月13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民法修正案,将法定成年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此外规定,无论男女法定结婚年龄均为18岁。这显然是在鼓励日本人赶紧造人。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的情况也与日本相似,例如,二孩政策实施以后,相当多的夫妇并不愿意生二孩。为此,相关部门在两会上也表态,将制定国家婴幼儿(主要指0到3岁)发展的规划,帮助人们照顾孩子,实际上也是表态,鼓励更多的家庭造人。

尽管现阶段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好像并不缺人也不缺劳动力,但现实的种种情况在多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劳动力的不足,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不足。媒体报道,元宵节(3月2日)过后,广州珠海区的城中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招工高潮,但是,月薪2万元,也招不到年轻人(“90后”)。

这种情况当然是劳动力的相对不足,因为年轻人,哪怕是农民工也不愿意在车间里做机械式的枯燥“苦力”,他们愿意干的工作是管理、财务、人事、销售等,这些工作相对而言比较轻松,也显得体面。

不过,现代管理还在以传统的管理人员与

息:大概是跟我一样想廉价解决食物问题的人太多,reduce go因为注册用户过多而暂停开放注册了。虽然还不知道下次开放注册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去加入“共享剩饭”大军了。

再说到“共享朋友”就更了不得了。其实准确地说这是“租赁朋友”:在某一平台上存在大量“朋友”,用户可以根据自己要求选择性别年龄等进行匹配租赁。日本的“租赁朋友”服务已经不是新鲜事了,甚至还有电视节目专门介绍过这一服务。我在网上搜索“租赁朋友”,随便点开一个网页,费用是三个小时120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700元左右。而且“朋友”只需要一起吃饭、喝酒、逛街等等(当然费用还是用户出),实在是一个“有油水”的工作。

话又说回来,什么样的场合让人不得不需要“朋友”出场,甚至不惜租一个“朋友”呢?这对于几乎什么事都能一个人做的我来说实在是想不到。看了“租赁朋友”的网站介绍,还真是有不少场景能用得到这项服务:“在聚会上需要有人衬托出我的存在”“结婚典礼上需要有友人出席”“去卡拉ok需要有嗓音不错的人给我唱歌”“……”看到这我简直无言以对,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不过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的,在二十人参加的聚会上,总有些人是比较“显眼”的存在,而有人就总是“配角”了,一般朋友聚会还好,如果是男女成对的“相亲party”,那确实有个能牺牲自己,烘托你“引人注目”的角色在是很有价值的。

其实不仅是朋友,父母子女恋人等等都可以租。朋友圈常年流传的“租个女朋友回家过年”,在日本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租”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金钱关系,不好听,所以有了“代行”一词:代替某人进行好工作。这正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小黄车”和“单反”:我们不再需要拥有它,只要在想用的时候去“共享”一个就好。

劳动力的比例来看待劳动力,例如认为管理员和操作工,中国1:8,德国约1:4是合理的。

而且,针对这种情况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教育配置严重不合理。例如,德国75%的中学生去了技校,中国90%的中学生去了大学(主要是文科)。所以,德国有工人干活,但中国的年轻人上大学后既无技能,又看不起并且干不了体力活,或蓝领工(dirty work)。

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即便德国有人干dirty work,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车间熟练工和重体力活了,而是干的技术活,而且是指挥和操作机器人干活。但在中国,工厂和工作场所的工作大多还是人工的体力和机械枯燥的工种。比如制造业中的哪怕相对轻松的制衣行业,也要求的是工人每天重复缝纫、锁边、熨烫、整理和打包等。

这显然已经涉及到今天和未来的新科技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新技术革命不仅要为工业和产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而且要提供更好更耐用更有效率的劳动力,因此机器人,尤其是带有人工智能软件的机器人就成为人工劳动力的最好替代,它们不怕苦不怕累,而且比人工的效率高百倍千倍。正因为如此,中国不仅要造人,而且要造出更多的机器人。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已经让一些专家在预测未来机器人大量或全面替代工人的可能性。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奥斯波恩和弗雷格根据大数据分析了今天300多种职业在未来的被淘汰概率。其中,工人,包括熟练工种,以及瓦匠、园丁、清洁工、司机、木匠、水管工等第一、第二产业工作的工人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的概率高达80%~60%,这也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因为体力活最容易被机器人取代。

当然,在他们的分析和统计中,最容易被机器人取代的劳动者前10位是:电话推销员、打字员、会计、保险业务员、银行职员、政府职员、接线员、前台、客服、人力资源员工(HR)。工人还好一些,只排到第13位。

要解决人口和劳动力问题,就只有一方面鼓励造人(生育),一方面造机器人。显然,在造人和造机器人这两方面需要适应现代和未来的要求,而且未来已来,不容再犹豫不决,踌躇不前!

科研

■吴硕贤

诗二首

何为科研大前提?
承认未知激好奇,
细致多方观事实,
厘清规律证猜疑。

研发常须日久长,
依凭反复究精详。
短平快就鲜佳果,
尤忌一枪换一方。

心得

诗二首